

# 一份報，兩代情

屠海鳴

明天，《大公報》就將迎來一百二十歲生日。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神聖的日子，因為，母親和我都與《大公報》結下了不解之緣。二十四年前，母親已離我而去；如果母親在天有靈，一定會給我布置一份特殊的作業：為《大公報》一百二十歲生日撰文。

我的母親高肖笑，曾任《大公報》高級記者兼上海記者站站長；也許是因為命運中的默契，從二〇一四年開始，《大公報》為我開設了「點擊香江」政論欄目，我每周都要撰寫三至四篇政論文章，至今已撰寫了一千八百多篇，將近四百萬字。在為《大公報》撰稿的過程中，我早已把自己當成了這個大家庭中一員，延續着母親對《大公報》的摯愛深情。

記得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一個深夜。母親把我從睡夢中叫醒，興奮地告訴我：「今天，香港《大公報》社長楊奇找我談了，她讓我盡快調到《大公報》擔任駐上海高級記者，並且着手籌備《大公報》上海記者站。」望着我母親高興的樣子，我知道這是她朝思暮想的一天，她新聞生涯即將開啟新里程。

母親是一九四九年從浙江溫州考進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她就一直獻身於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一幹就是三十七年，採寫了成千上萬篇新聞報道。我於一九八三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職業生涯的第一站也是《解放日報》。一九八八年，我和母親同時當選上海市「首屆十佳新聞記者」，從德高望重的老市長汪道涵手上接過了獎狀證書。汪道涵握着我們的手說：「你們母子倆同時當選上海首屆十佳記者，這就是今天最大的新聞。」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母親正好有機會赴香港採訪。經她的同班同學、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唐篤時的引見，我母親見到了剛剛出任《大公報》社長的楊奇。楊奇社長熱忱地邀請她為《大公報》撰稿，還專門向上海市領導打了招呼，讓我母親挑起為《大公報》撰稿的重擔。《大公報》這些來自上海的文章刊登後，經常被其他港媒所轉載。《大公報》的讀者也漸漸知道了報社有一位上海的特約記者叫高肖笑。

寫着寫着，母親越來越鍾愛《大公報》。她與報社編輯部的許多同事也越來越熟悉了。楊奇社長很快決定成立上海記者站，並動員我母親出任首任站長和高級記者。就這樣，一九九〇年，我母親在她五十七歲那年，成為了《大公報》的正式一員。

白手起家，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從約稿、採訪、編輯到廣告、發行，她一身數職，什麼活都幹。雖然很累，可她幹勁十足。有一天星期日下着滂沱大雨，家裏來了不少客人，可我母親急着要外出，當客人問她：「你星期日也要採訪？」她回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去報道。《大公報》是沒有星期日的。」

後來，我母親拉來了她在《解放日報》的二十多年老同事、著名經濟記者干谷。自此，《大公報》反映上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各種新聞報道更加有聲有色，從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啟用、浦東的開發開放，到上海地鐵建設、中外合資企業落戶，《大公報》見證了上海發展的每一個節點、每一項成果。上海首座越江大橋「南浦大橋」竣工通車，我母親與干谷一起，寫了十多篇文章，約了三十多版祝賀廣告，其宣傳的角度、深度和廣度甚至超過了上海的地方媒體。有一次，楊奇社長和副總編輯陳彬訪問上海，拜會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上海市長黃菊，上海領導親切地對楊奇說：「感謝大公報的大力宣傳，感謝你們在上海設立了記者站，感謝你們選派了優秀的記者。」

在《大公報》日子裏，我母親十分節儉，一分一釐都為報社考慮。外出吃一頓飯、坐一次出租車、打一個長途電話，都是省了再省，渾不在意或追求已經開始漫天飛舞誘惑的名繯利索。她和干谷不僅白手起家為報社添置了好幾處物業，還為報社創造和累積了許多財富。母親常說，雖然遠離總社，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經得起領導的監督，經得起同事的評價，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以後，記者站升格成了辦事處，我母親擔任了辦事處主任，《大公報》在上海的影響也更大。

一九九六年，我母親在為《大公報》兼職和全職工作了八個春秋後，因為年齡關係，她離開了報社。可就在她一年後身患絕症住進醫院治療和搶救的最後時刻，她依舊念念不忘《大公報》和那些曾在《大公報》一起共過事的香港同事。她每天都要我把當天的《大公報》送到病房。在她人生的最後兩個星期，她顛顛抖抖地給我一張名單，裏面整整齊齊寫着二十多位她的好朋友的姓名、單位、地址。她告訴我，這是她三個月前就寫好的。她讓我要保持與這些好朋友的聯絡，以後有空要代表她經常去看望他們。在這份她最為摯友的名單中，有好幾位都是《大公報》的老同事。

一九八九年，我做了人生最艱難的一項決定，告別了我工作了六年的解放日報社，來到香港定居。後來，我下海經商，又回到上海興辦房產公司。隨着事業的發展，我也漸漸有經濟實力做慈善事業，曾獲得「中國慈善特別貢獻獎」、「上海市慈善之星」等榮譽，還連續擔任了五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常委。然而，隨着時光的流逝，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用財富救助他人，救助的範圍是有限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能推動社會進步，也更能體現人生價值。

記得二〇一四年初夏的一個傍晚，我正在維港岸邊散步，晚風習習，燈火璀璨，「東方之珠」的魅力令人沉醉。突然，電話響了，是我母親生前的閨密、《大公報》資深主筆葉中

敏打來的，她約我寫點評論文章，駁斥一下某些人所謂「真普選」的荒謬觀點。那正是非法「佔中」爆發前期，反中亂港勢力頻頻造勢，蠱惑人們上街抗議。我想了想，答應了葉師姐的邀約。

重新拿起筆，心中激盪着愛國愛港之情。我寫下了《荒謬邏輯一掃即破，「愛國愛港」不容挑戰》《反「佔中」簽名十天破百萬：真實民意擊穿謊言》等多篇政論文章，在《大公報》上刊發。初次出手，閱讀量就達到每日排行榜的前幾名，令我有了信心。我根本不曾想到，已經擱筆二十年的我，因為一份《大公報》，會重操舊業、重溫舊夢。不久，《大公報》為我開設了「點擊香江」專欄，讓我有固定了「用武」陣地。

二〇一九年是香港回歸後最動盪的一年。一群自稱「愛香港」的人，把香港蹂躪得遍體鱗傷；一群高喊「自由」的人，不斷侵犯他人免於恐懼的自由；一群自詡為「民主鬥士」的人，不允許不同政見者發出聲音；一群分享着「一國兩制」巨大紅利的人，公然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那一年，我在《大公報》刊發了近二百篇政論文章，與「港獨」勢力進行了堅決鬥爭。我的政論文章大致分為四類：緊扣一個「理」字，講好「一國兩制」的硬道理；緊扣一個「法」字，闡明法治底線不可逾越的大原則；緊扣一個「情」字，喚起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真情感；緊扣一個「夢」字，激發香港同胞同心共築中國夢的精氣神。正是因為講「理」說「法」、聚「情」築「夢」，影響力越來越大，許多文章在社交媒體廣為傳播，其中《大學生淪為暴徒是全香港的悲哀》一文，讀者點擊量高達三千五百多萬次。我還將在《大公報》刊登的政論文章匯集成冊，先後在香港公開出版了《救救患病的香港》等四本書。

二〇二一年三月八日，全國政協成立七十二年來首次頒發「全國政協委員優秀履職獎」，我有幸成為二十名獲獎者之一。當我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手中接過獎狀，我明白：這個獎狀是給我的，也是給《大公報》的。能在《大公報》這個平台上為國發聲，我感到無比驕傲！

往事歷歷，令人感慨萬千。我還清楚地記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期間，我應邀赴京參加國慶七十周年觀禮，在九月二十八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我作為第一嘉賓，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汪洋主席身旁。「海鳴，辛苦了！」汪洋主席一見我，親切地握着我的手說。席間，他仔細詢問香港的情況，對香港同胞的關愛之情溢於言表。他鼓勵我，要繼續主動發聲，用正義之聲驅散人們心中迷霧，回擊反中亂港勢力的進攻。

二〇二〇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



▲這是本文作者的母親高肖笑等新聞記者，在一次外事活動採訪結束後，與周恩來總理合影。作者供圖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出席全國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議講話時說：「我每天都閱讀來自香港的新聞報道，中央時刻都關心關注着香港。」會後，他親切地對我說：「我常常閱讀你的評論文章，很好！」

這些年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更是對我悉心指導和鼓勵。我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文章，他幾乎每篇必看，並經常交流觀點。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十三屆全國政協三次會議舉行大會發言。我第二次站到人民大會堂的講台，作了《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 徹底鏟除「港獨」生存土壤》的發言，我告訴全場全國政協委員，二〇一九年六月以來發生的數百起暴力事件，徹底顛覆了人們對香港的認知，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動盪中，街頭戰和輿論戰同時進行。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我從一開始就主動參與這場輿論戰，撰寫了二百三十多篇政論文章，在《大公報》等香港主流媒體刊登，與反中亂港勢力進行堅決鬥爭。我的發言，多次被政協委員們的掌聲所打斷……

風雨過後是彩虹。如今，香港處於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輿論戰場上的激烈交鋒已經過去，但我的筆不能停。我明白，在穿越一百二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大公報》始終保持「鐵肩擔道義」的本色不變；作為《大公報》的特殊一員，《大公報》的基因已經融入我的生命，我與《大公報》不可分離，魂魄如一。

《大公報》走過了一百二十年，母親和我兩代人有幸與《大公報》同行了三十四年。我想，假如母親知道《大公報》今日的輝煌成就、社會影響和責任擔當，一定會感到由衷的驕傲和自豪；假如母親知道我現在在為《大公報》撰稿，一定會為我點讚。她對《大公報》的摯愛深情，沒有因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而是在我的手中延續。

人世間，難道還有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嗎？

## 魅力都會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六月至十月推展「花悅滿城」計劃。

六月十四日，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設置的「魅力都會」垂直花牆已經完工，花牆以翠巒及摩天高廈的城市天際線為背景，襯托山頂纜車及摩天輪造型的擺設，營造出活力澎湃且繁榮昌盛的氛圍，展現東方之珠的無比魅力。 中新社



## 致敬經典

上周五晚，去文化中心大劇院欣賞香港舞蹈團《一個人的哪吒》首演。上次入劇場，已是半年多前的事情。在諸多不確定的疫情下，仍有機會與眾多喜喜藝術的人們一同身處劇院中，近距離感受台上的喜樂與悲傷，從他處故事中得到安慰和滋養，真真是幸運的事。

近年，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的不少作品，皆自中國傳統文化和傳說故事中尋覓靈感，《一個人的哪吒》也不例外。身為托塔天王李靖第三子，哪吒天賦異稟，武藝精強，卻養成桀驁不馴的性情。某次他失手打死龍王三太子，闖下禍端，不連累父母而自戕，終於感化神明，從蓮花中重生。過往，我們在動畫片或電影中見到的哪吒，常常是古怪頑皮小孩模樣，而在今次香港舞蹈團舞劇中，哪吒絕非不諳世事的莽撞孩童。他有思想，有主見，有敢於挑戰命運的勇氣



▲香港舞蹈團《一個人的哪吒》劇照。

和擔當，當然也有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無奈與孤獨。

楊雲濤和香港舞蹈團一眾舞者，再詮釋哪吒的故事，絕不止於致敬經典，更是編者與舞者個人經歷和情感投射的投射。因疫情反覆，今次舞劇的創作過程中，編創人員常常需要借助在線會議

工具而無法面對面傾談，物理層面的隔閡愈發加重了創作中的孤獨感，正如楊雲濤所言，最終呈現在舞台上的，「不只是舞蹈的孤獨，也是燈光的孤獨、布景的孤獨」。編創團隊用極簡的燈光、道具、布景和音樂，以片段式的方法說故事，不求烈火烹油的生猛，而是為了將原本戲劇化的、起落開合的故事外衣撥開，呈示潛藏於心、難以言說的孤獨。哪吒性格中原本張揚放縱的那一面被壓抑，取而代之是編創和觀者借由台上的故事反觀己心，回望自己成長過程中的遭遇乃至蛻變，並心有戚戚。

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始終懸在舞台上空的那一隻碩大的圓環。作為今次演出道具和布景最重要的呈現元素，它是多義的：既可指代哪吒的乾坤圈，也可視作某種桎梏或成規的暗指。至舞作最末，當重生的哪吒繞着舞台自在跑動的時候，圓環緩緩落下，又彷彿是生生不息的象徵。如是，便顯出舞劇的有趣耐讀之處：一千個人眼中，或也有一千個哪吒的故事。



市井萬象

## 成化鬥彩雞缸杯

馬末都先生是中國瓷文化的大家。他曾非常自豪地講過，一九九三年去日本，日本一位瓷器收藏家請他去家中喝茶。所有的程序，所有的排場，所有的講究，馬末都泰然待之，見之多矣。但當一位身着和服的僕人，端着黑漆描金的托盤上茶時，托茶盤上只有一隻小小的茶杯，卻使馬末都眼前一亮，那竟是一隻成化年間官窯出品的成化鬥彩雞缸杯。馬末都說，他自認是見過些世面的人，與名人品茶亦多矣，但此次卻把他震住了。可謂「激動的心，顫抖的手」，用馬末都的話說：「我端着這杯茶，小心翼翼地嘗了一口，我覺得這是我平生喝的最貴的茶。」這才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茶杯也。

成化鬥彩雞缸杯多數深藏於各大博物館，或大收藏家手中，「見杯如見君」，真正端起的人更是寥若晨星，而馬末都竟用此杯喝過茶，當應自豪。現在故宮博物

院珍藏着一對明成化鬥彩雞缸杯，要上手持耳，難如上青天。明成化年間既無「中興」，更無「盛世」，留於後世的幾乎都是昏庸無能，民生凋零。明朝第八位皇帝明憲宗朱見深執政二十三年，所用年號只有一個：成化，稱成化皇帝。成化皇帝留在歷史上最大的話題似乎是愛戀比自己大十七歲的萬貴妃，且一愛終生，終身不渝。但誰能想到，因為萬貴妃鍾愛鬥彩瓷器，珍愛鬥彩雞缸杯，竟使得「成化」的年號垂青史，成化鬥彩雞缸杯成為中國瓷文化的重要一頁，成為中國名瓷收藏的珍寶。

其實就在明朝，成化鬥彩已然名揚天下，天子尊，皇室尊，士大夫尊。據明史記載：「神宗尚食，御前有成杯一雙，值錢十萬。」

到萬曆皇帝，御前擺一對鬥彩成化杯，足以壯尊，足以提威，

足以拔份。想起三百年後，慈禧皇太后「尚食」，是講究把十條城隍廟中的供案拼接起來，擺上一百多種佳餚，一盤只吃一箸，一湯只飲一口，擺的也是排場，講究的也是威嚴。其事悠悠，其時亦悠悠。當然成化鬥彩瓷器並非只有雞缸杯，像珍藏於故宮博物院的鬥彩海獸罐、鬥彩海馬罐、鬥彩葡萄紋高足杯，都是著名的稀世寶瓷。成化鬥彩雞缸杯的釉畫是一個和諧、親密、友愛的雞家庭，五彩的大公雞正在引頸長啼，像在呼朋引伴；又像在向天高歌；而溫和漂亮的母雞正在尋找小蟲覓食幾隻小雞，小雞正開胃，玩得正熱鬧開心；母雞正引導三隻小雞在啄食一隻爬動的蜈蚣，母子和睦，全家幸福，情趣盎然，生動形象。背後是五顏六色的鮮花野枝，奇石鮮草；一片和睦，一片自然，一片幸福。

（「聽瓷·鬥彩」之六，標題為編者加）

閒話煙雨  
白頭翁